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经济学部卷 (下)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学术自传

陳奎元
印

经济学部卷
(下)

周溯源 赵剑英 主编

下册目录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何振一：耄耋之年回眸治学路 / 413
- 汪同三：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伴我同行 / 427
- 汪海波：从小山沟走上科学殿堂 / 441
- 张守一：从放牛娃到荣誉学部委员 / 461
- 张卓元：回顾六十年经济学研究 / 497
- 陈栋生：布局中国的思索 / 517
- 金 碚：以科研为乐，忙不离本分 / 535
- 周叔莲：我对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研究 / 561
- 赵人伟：学术探索之旅 学问人生之悟 / 591
- 聂宝璋：聂宝璋学术传略 / 619
- 高涤陈：唯有奋争结硕果，只作细流也堪清 / 637
- 高培勇：在探求做学问的“真”境界中前行 / 659
- 蔡 昉：把经济学研究作为生活方式 / 701
- 戴园晨：学术研究要有“知识”“见识”“胆识”三重境界 / 727
- 后 记 / 763



何振一

He Zhenyi

男，1931年生，籍贯辽宁海城，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工作，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所从事财政与企业财务研究工作，1978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学位委员，财政金融室主任。曾任政府兼职：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起草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办、国家教委学位及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专家，纺织部经济中心顾问，机械电子工业部政策法规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市社科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中心顾问、本溪市政府经济中心顾问。曾任社会兼职：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经协会个人会员。

主要从事财政与财务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学术代表作有：(1)《工业企业经济核算制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83 年 9 月第一版，提出以责权利统一原则建设企业经济核算制度的理论与方法新体系；(2)《理论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 3 月第一版，2005 年 4 月第二版，2015 年 6 月收入《社科学术文章》，提出：财政起源新材料和新结论；开创财政分配客观数量界限研究之先河；提出财政职能范围随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运行模式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理论新说明；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财政效果评价的新指标体系；构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为主线，财政关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全新的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新体系，被财政学界称为“社会共同需要论”这一新的理论流派的创始人。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有 5 项成果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并在宏观决策中采纳或作主要参考。1992 年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0 余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财政学会的优秀著作奖。

耄耋之年回眸治学路

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我出生在东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房无一瓦地无一垄，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由于地租沉重，一遇荒年就要靠糠菜半年粮来充饥。家中无钱读书，几代人都是文盲。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大众闹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广大农民有了土地，也给穷人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怀着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万分感恩之情走上工作岗位的。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同年冬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爱人民，一切都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以及八路军爱民的模范行动，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46年冬实施土地改革，成立了农民协会，父亲和我都投入轰轰烈烈的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中去，我担任了基层政府及农会的通讯员工作。1950年毅然参加了抗美援朝。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到经济研究所后，我发现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高层次人才济济、学术大师云集之处，经济所学术大师也不少，我感到党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真是幸运之至。我暗下决心，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以报答国家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就这样一干就干到

今天，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调来之前，我已知道是要陪同苏联专家做助手工作，到所后的具体工作是陪同专家外出调研，听专家给有关方面讲课，回来后做帮助抄写资料、整理资料等科研辅助工作。不久专家被撤走回国了，我被安排在财政与金融室从事财政与财务科研工作。

一 初次试笔的喜悦与尴尬

来到财金室后，我接受的第一件研究工作，是著名经济学家狄超白所长交下来的，他叫我去国务院“五办”找武博山先生。到“五办”后，武先生对我说：“想请你替我写一篇关于税制改革的文稿。”接着就讲了他的主要观点，讲完后指示我按他讲的意图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拓展成一篇可以操作的研究报告，写好后交给狄所长就可以了。回来后我反复思考武先生所讲的要求，先拟了一个写作提纲，就着手写作了。我只能用所学的理论进行抽象说理来表述武先生的观点，至于对改革的对策建议，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只限定3天交稿，时间过去两天了，由于这是来所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第一次试笔，就完不成任务，我觉得十分尴尬，我就去求助先来所的同事帮助，可他们也帮不了我的忙，没办法我只好去找狄所长报告，我没有水平完成武先生交办的任务，准备接受他的批评。没想到狄所长听我说完后，哈哈大笑，对我说：“没有这个本事吧，不要紧，这件事我们就不给他干了，你回去干别的吧。”就这样回到办公室后，我心中仍然不安，想会不会不要我了，不料第二天狄所长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很客气地说：“你请坐，我想和你讲讲治学道路问题。你既然来到科研机构，就应立志使自己成为很有成就的科学家，

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最近我了解了一下你的经历，你在大学时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是全校少有的几名获得全科5分的学生，毕业论文也得到老师的好评，但你学的都是书本知识，实践知识十分不足。尽管你是农村长大的，农民家庭出身，干过农活，又从小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基层政府的工作，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实践知识虽然宝贵，可是这点实践知识并不能适应你现在承担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你为什么不能完成武先生交给你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你不懂工业实际，不懂商业知识，更不懂财政和财务实践知识。我认为你的研究工作路径应当从调研起步，先熟悉国情，大量积累经济实践知识，增加感性认识。你也知道我和所内青年同志的分歧就在于，我要求他们广泛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熟悉中国国情，丰富自己的实践知识，可他们不理解。希望你从这次执行任务的失败中接受教训，不懂实际，怎么能写出可操作的对策性研究报告呢。你从现在起用两至三年时间，深入基层去调查研究，补上实践知识贫困这一课，这三年不要求你拿出论文，当然你在调查研究中如果有所发现，有所心得，可以试着写个调研报告给我，就这样吧，希望你能按照我指给你的这条科研道路走走看。”与所长谈话后，我反复思考，感到所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下决心走走看，我是学财政和财务的，因此我首先到财政部门调研，财政部门不仅热情接待我，并送给我一大批业务资料，还告诉我他们正要去上海进行税制改革和工商分利的调研工作，欢迎我参加。从此，我和财税部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成了我的学习和调研基地。在所长指导下，我正式走上了经济科学研究的征程。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调研班子一块到上海实地调查的一个多月中，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财政税收实际运行的知识，也学到了许多工业企

业的生产与管理的业务知识，使我头脑中相关的理论知识同这些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各个理论范畴就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原来在研究中只能进行抽象思维，现在变成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紧密结合的新的思维方法，真有调研一个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回到北京后，我试着写了一篇关于工商争利实质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写成后，我先送顶头领导、我的良师益友，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审阅，他看后认为还是有点道理，可以打两份送给狄所长看看。按他的指示，我打印后送给狄所长，请他批评指正，他看后并没有说太多，只是说“报告留我这，我请‘五办’的人看看，希望你能把调查研究工作坚持下去”。所长虽然对调研报告未加评论，但我感到这个报告可能有点意思，我很高兴，从中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是调查研究先行。此后，我用了两年时间跑遍了工厂、矿山、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基层、深入车间和矿井的调研，去考察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管理运营过程，以及企业成本核算、财务管理过程等，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实际业务知识。从此以后，每当思考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会立刻与我知道的实践情况联系起来，使我的研究活了起来。我进一步体会到书本知识再多，没有丰富的实践知识，是做不好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国情，做理论应用性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只能是晦涩的。当然有了实际知识积累，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研究新课题依然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依然要调研先行。因为第一，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先前积累起来的知识，那只是过去的经验，仅用过去的知识来解决变化了的新问题，就会陷入经验主义，难以正确认识问题；第二，正确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而理论是否正确，还要由实践来检验，所以，每一项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结论，都必须回到实

践中去检验，这样才算是完成了研究的全过程，得出的理论才有希望贴近真理，对实践发挥有益的作用。

二 不断夯实基础,努力多做贡献

自1956年春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至今我的学术生涯已达60年，大体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夯实基础条件，努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阶段，研究成果不多。这是因为前一个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时间被“运动”掉了，其中最为集中的运动，就是先被下放到农村搞“四清”运动，而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加起来达16年之久。其余的一些年中也还夹杂着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下乡劳动等。加之当时我在北京没有家，住在办公室里，可以说毫无私密可藏，没有条件躲藏起来搞课题研究。然而我不甘心把研究工作荒废了，我给自己设计出一个办法，就是不能铺纸写文章，但可以看书，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可以用卡片摘录资料，并设定课题在头脑中研究，只思考，不动笔写文章，可以夯实理论基础，为今后研究快出成果做准备。例如在农村搞“四清”时，我就借机了解农民、农村、农业中的问题，充实实际知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就精读《毛泽东选集》；下“干校”后，“宣传队”搞“清查”，我借机系统地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进一步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备在今后研究中正确运用。总之在那些“运动”中损失的16年时间里，我虽然不能在明面上开展研究工作，但还是为后来进行财政基础理论创新，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我的实践知识，增强了对策性研究能力。总之，前25年虽然科研成果有限，

但在提高科研能力、夯实科研基础条件方面，都取得了极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春天。为夺回过去损失的时间，我坚持低调做人、高标准治学的人生理念，不求权、不求名、不求利，只求在科研工作中，为改革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为了多出有益于改革开放事业的成果，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着。35年来我发表了近300项学术成果，其中有百分之十的成果，得到政府有关领导肯定并在宏观决策中采纳或作重要参考，或为学科建设起添砖加瓦的积极作用。

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的成果有以下三项：（1）1983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工业企业经济核算制理论与方法》，提出管理体制改革的以责、权、利统一原则为指导的理论，并以此理论为指导，构造了一个企业经济核算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体系，为企业财务管理学创新和改革做出贡献，也受到了企业的欢迎。（2）1987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理论财政学》专著，被财政学界公认为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流派的开山之作，也是实现财政学理论创新之作。该书突破了传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类社会财政一般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为理论主线的财政学科新理论体系。它不仅填补了迄今为止国内外财政学者只研究财政个别，而忽略了财政一般研究的空白，还创新了财政学科理论体系，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财政职能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做出了新的理论说明，开创了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财政分配客观数量界限研究之先河。它修正了德国经

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的国家财政持续增长法则之片面性，提出了考评财政效果的新理论。(3) 199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构造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财政体系》一书，是财政管理改革学的一部理论专著。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对中国财政职能范围的界定依据和标准，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依据和改革目标及对策体系。

咨政性研究成果得到历届政府高层领导及部门领导的肯定。主要有以下几项：(1) 1983年完成的《关于改进利改税办法的建议》一文，直接呈报中央后，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并在第二步利改税的税制设计中被采纳。因此，在第二步利改税前被邀请改成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2) 1992年在《改革》第6期发表的《论经济体制大变革中的财政职能问题》一文，曾直呈财政部领导参考，得到财政部领导的赞同和采纳，并因此在财政学界发动了财政职能的大讨论。(3) 1994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发表的《深化事业体制改革的大思路》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事业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及其改革方略和方法，此文发表前已直呈财政部领导，得到了充分肯定和表扬，并在1994年作为会议文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的事业财务工作会议上印发，得到会议成员一致赞同，并决定按此思路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意见至今仍对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起着理论支撑作用。(4)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刊发的《改革农村公共分配制度方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一文，提出要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改革农村公共分配体制和制度方能达到目的的建议，得到国家决策层的充分肯定并在决策中采纳。(5) 1999年写作的《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直呈国务院后，得到国务

院主要领导的肯定，并批转给财政部部长及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6）2000年受国土资源部委托的研究课题《中国土地价、税、费问题的改革方略与对策》的研究成果，呈国土资源部后，在课题结项验收会上，得到国土资源部领导和与会的相关部门代表的充分肯定，并在后来有关改革中发挥着理论支撑作用。（7）2003年完成的《物业税与土地出让金不可相互替代简论》一文，呈财政部部长后，财政部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验证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采纳，并改变了原有的改革设想。

三 矢志不渝育英才

在做学问的同时，我还努力培养研究生。培养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说，比起做学问对国家、对社会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在这方面我也是十分用心的，成就也较为突出。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这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名师也能出高徒，这决定于老师对自己、对学生能否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努力学术创新，丰富自己的实践知识，用新的理论和知识教育学生，并严格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位论文选题上，要求文章一定要有前瞻性和理论创新性，对策意见要有可操作性。因此，每当新生到校后来见老师时，我都要对学生讲，我讲课的内容与你们在本科乃至硕士生阶段学习的知识会是不同的，希望你们首先把我讲的弄懂、弄通，然后对我讲的理论或进行拓展，或进行批判，乃至反对都可以。包括你们将来的毕业论文，我不要你们与老师观点一致，研究生嘛，就是学习和提高研究问题的

能力，将来好为国家做大事情，为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我要求你们经过三年学习后要比我强，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践表明我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比我强，现在都成长为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高层人才和专家，我十分欣慰。



1997 年在家指导博士生学位论文撰写

我的科研工作历程说到这，也就可以结束了。接下来，我把多年治学的心得和经验概括地总结一下：第一，做学问必须首先做好人。不少做学问的人都推崇王国维大师的治学三境界，认为个人治学要做出艰苦努力和付出，才能取得学术收获。然而做学问，做好学问，除了要经过王国维所说的三个境界外，更重要的是人的高素质，就是说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做好学问的前提，修身

就是要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一颗淡泊名利、甘于平凡，耐得寂寞，耐得清贫，坐得住冷板凳，心无旁骛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献出毕生精力的赤诚之心。马克思之所以能完成伟大的著作《资本论》，除了他的天才和勤奋，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树立了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为了天下劳苦大众，放弃了他完全可以取得的功名利禄，忍饥挨饿，耐得清贫，40年如一日地为人类谋幸福的痴心不改；司马迁为真理不畏险阻，耐得清贫，不顾个人安危，历时18年撰写了不朽著作《史记》。因此，立志做学问者都应学习这种精神，方能取得有益于人类的学术成就。

第二，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学问要调查研究先行，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识论为指导。毛泽东同志对理论工作做过定义性说明，他说：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作理论工作。搞一个研究课题，仅仅是翻翻几本书，上网搜索一下，然后坐下来关门苦苦思索，是不可能作出有真知灼见的理论创新之作的，也做不出能指导宏观决策的研究成果来。我所完成的对策性理论成果中，凡是认真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去做的，无一不被有关政府部门采纳；凡是没有认真去做的，尽管媒体欢迎并刊载，但对改革实践都没有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最多发挥点宣传作用。

第三，科学思维，即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思考，切忌片面。对研究的课题要全视角地考察和思考，得出结论时要换位思考，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对自己的结论进行拷问，看是否站得住脚。要敢于思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不怕权势、不怕权威、不迷信书本知识，勇

于探索真理，勇于坚持真理，但又不固执己见，勇于吸收反对自己观点的人的有益的东西，如果讨论中发现自己的结论不全面或者错了，要闻过则喜，勇于修正或改变自己的结论，服从真理。



2011年10月在家写作

第四，要谦虚，善于从别人那里学习长处，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必有自己的短板。孔夫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的每项较为成功的研究成果，都无不是经过求教诸多老师才取得的。例如我的《理论财政学》专著，它涉及社会发展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这些知识对我来说都是短板。这些知识仅靠翻翻书本是无法满足我的研究需要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找这方面专家请教。为此，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找这些方面的专家请教和探讨，到史前遗址去考察，

向遗址管理者请教，以取得实证资料，才逐渐形成财政产生于史前的结论。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做好一项学问，取得好的成果，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总是在众多人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才得以成功的，做学问千万不可自满和故步自封。

第五，要积极借助和欢迎学术批评，健康的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乃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已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在学术批评与争鸣的认识上有一句名言，他说：两物相碰会同归于粉碎，两个智慧相碰会迸发出天才的火花来。我那本《理论财政学》就是经历学术界几年的热烈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的推动和帮助下才完成的。

最后，借用一句话结束我的治学之道自述：“凡事欲成功，必须付出代价——奋斗”（爱迪生语）。

何振一

2011 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 年春修订